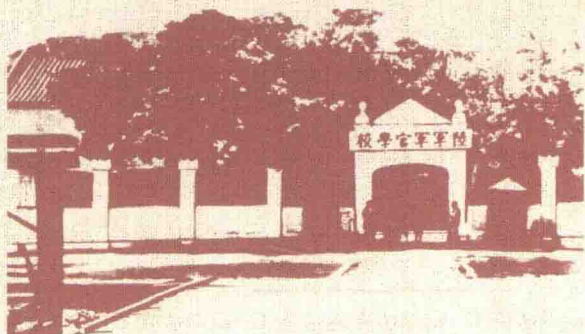




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

本书受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资助



DIYICI GUOGONG HEZUO
ZAI GUANGZHOU

黄志坚
◎
著

第一次国共合作 在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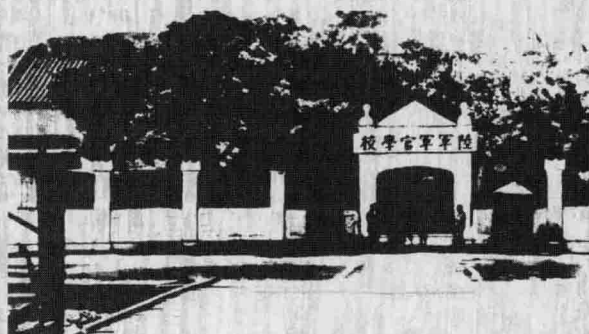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

本书受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资助



DIYICI GUOGONG HEZUO
ZAI GUANGZHOU

黄志坚◎著

第一次国共合作 在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黄志坚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5668 - 1101 - 1

I. ①第… II. ①黄… III. ①国共合作—史料—1924—1927
IV. ①K262. 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6532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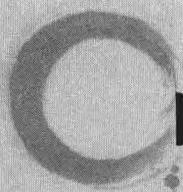
字 数: 268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4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录

◎ 绪 论	1
◎ 第一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背景	6
第一节 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理论	6
第二节 共产国际、苏俄（联）的东方政策	10
第三节 “二七”罢工失败引起的思考	16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理论认识不断深入	20
第五节 饱尝失败苦果的孙中山和国民党	28
◎ 第二章 国共两党在广州开启合作	33
第一节 中共中央迁粤	33
第二节 中共三大	42
第三节 国民党改组	62
第四节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71
◎ 第三章 国共两党在广州的发展	82
第一节 组织发展	82
第二节 干部培养	97
第三节 工、农、青、妇运动的发展	120
第四节 平叛和广东国民政府成立	176
◎ 第四章 国共两党在广州的矛盾与冲突	184
第一节 国共合作初期矛盾和春园谈话	184
第二节 廖案	190

第三节	国民党限共	193
第四节	中共的两难	209
◎第五章	刀兵相见：广州起义	216
第一节	国民党“四一五”政变	216
第二节	“四一五”政变后国共在广州的博弈	223
第三节	广州起义	231
◎结语	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圣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广州 ...	246
◎参考文献		256



绪 论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一次国共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国共两党在此次合作中迅速成长，革命势力推进到长江流域。这次合作牵涉到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各种政治势力博弈，并深刻改变了中国政治势力版图。由于各阶层都迫切地想改变中国积弱的现实，各派人物、思想纷纷涌现，整个社会波动不安、光怪陆离，而又气象万千、充满激情。这样一段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国内各因素交织的历史，在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并不多见，因而长期吸引研究者的注意；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也一直是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国外学者也关注第一次国共合作历史的研究，美国学者伊罗生著有《中国革命的悲剧》（刘海生译），作者以记者及中国生活观察者的视角，研究了大量直接材料，比较客观地探索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段历史，长期以来被世界学术界公认为一部经典著作。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著有《国共合作》（罗可群译），主要是从通史角度阐释了国共合作历史；美国学者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的《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王淇等译）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来华活动的角度阐释了当时的国共合作。日本学者横山宏章参加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提交了论文《马林、孙中山、国共合作——以马林档案为中心》，以马林档案为中心解读了国共合作。国外学者从外国人角度提供其观察视角，是我们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

港台地区学者也非常注意研究中共党史，台湾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郭华伦《中共史论》、王建民《中国共产党史稿》，香港司马璐编著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都有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论述。由于政治立场和所占有的史料与大陆学界不一致，台港地区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



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个视角。

中国大陆学者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面的研究著作可谓琳琅满目。从通史角度，有唐培吉著《两次国共合作史稿》，黄修荣著《第一次国共合作》，杨世兰、史久远、余茂笈主编《国共合作史稿》，林家有主编《国共合作史》，徐矛、石源华著《国共合作史话》，秦野风、白玉武、冯连举编著《国共合作的过去与未来》，李良志、王顺生编著《国共合作历史与展望》，李淑媛著《国共合作简史》等等。

也有的学者侧重从北伐战争、黄埔军校等军事角度阐述国共合作，如陈伙成著《国共合作北伐记》，曾成贵、江抗美著《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卜穗文、孟育东著《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史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张光宇著《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也有学者从大革命角度阐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其中有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姚金果、苏杭著《解读中国大革命史》，吴斐民著《中国大革命》，王宗华、马菊英著《中国大革命史纲》。

也有的学者以国际视野角度来观察第一次国共合作，如杨奎松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作者在序言中一口气提出16个为什么，指明了从国际视野角度考察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具体行文中更是搜罗了诸多史料证明了中国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发展实际上是与外部世界发展息息相关的；在吴祖明主编的《中国大革命与亚洲》中收录了《中国国民革命与亚洲民族的复兴》、《国民革命——亚洲革命的升华》等论文；黄修荣著有《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书，向青著有《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杨云若著有《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一书；苏杭、苏若群、姜羿编撰的《绝密档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依据俄罗斯公布的一大批有关中国问题的秘档，深度解密两党从对立到合作的复杂过程。

还有学者从国民革命角度阐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如“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中王奇生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曾庆榴著《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有学者从人物角度来阐释第一次国共合作，如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李大钊与第一



次国共合作》；有学者从国民党角度阐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如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李玉贞先生则别出心裁，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角度出发，以30年研究功力著有《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作者具有语言优势，应用了大量国外原始史料，内容广博而逻辑严整，以苏俄和中国国民党各自的利益诉求为分析主轴，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王奇生著有《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该书不仅提出了国民党“弱势独裁”这一观点，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有比较详尽的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由此引起的革命剧变在中国历史上是波澜壮阔、影响全国并波及后世的历史事件。它的影响在全国各省表现力度和形式并不一致。有些省份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翔实的资料整理工作，如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江苏》、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陈鹤锦在《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发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江苏》等。从地域角度出发观察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本书的研究也是顺承这一思路出发的。

二、写作缘由

广州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心。明确提出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针策略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三大），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国民党一大，都是在广州召开的。省港大罢工、农讲所和黄埔军校的建立、“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东征和北伐等一系列国共合作中具有标志意义的历史事件，多与广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国内、国外很多报刊常用“广州”、“广州方面”、“广州政府”来指代广州国民政府及其代表的国共两党联合力量。党史工作者在“广州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整理了很多史料，如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收集整理的《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广州市志》卷十一中《中国共产党广州地方组织志》，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辑录的《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选编》，陈登贵、江铁军选编的《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林锦文



辑录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等等。除了史料整理外，在诸多广东地方通史著作中，对广州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有诸多著述。如方志钦、蒋祖缘主编的《广东通史（现代部分·上册）》，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了阐述；广东民国史研究会编的《广东民国史（上册）》第三编《国民革命与广州国民政府》、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第二章《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对国共合作都有论述。在广州地方通史著作中，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有《中共广州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历史有比较详尽的论述，其论述重点在党的发展和大革命发展；杨万秀主编《广州通史（现代卷·上册）》第二章到第四章论述了国共合作从建立到分裂的过程；曾庆榴著有《国民革命与广州》，书中选录了近40篇论文，对20世纪20年代前后发生在广州的与国民革命有关的诸多历史事件做了有益的探讨，许多论点颇有创新。然而，尚缺少从整体论述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的著作。

笔者自2004年7月在广州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工作后，由于工作的关系，开始接触许多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面的材料。特别是2006年参加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历史陈列提纲编写和在该纪念馆工作后，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逐步萌生了收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的资料并撰写相关著作的念头。笔者认为，需要一部《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这样的专著，方能与广州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相称。

三、写作思路

（1）避免写成大众化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叙述性通史。笔者特别注重收集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的档案、文件、回忆录、报刊资料等史料，有些资料为以往的学术论文中没有或很少提及。笔者力求以史实说话，而杜绝过多的人为论述。比如广州起义，笔者叙述其酝酿、发生以及影响、意义等，基本是从档案入手，以求贴近历史真相。

（2）避免写成中共广州地方党史。毫无疑问，中共广州地方党组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现行体制下，我们所看到的材料，也偏向中共党史。所以本书的写作，无论是工人运动，还是农民运



动、青年运动以及妇女运动等，都力求从国共两党的立场和政策出发，从而避免写成一党的贡献。大革命的发生，应该说是国共两党共同促进的。

(3) 把广州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放在国际大背景下理解，包括列宁相关革命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共产国际、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并引用一些国外报刊资料对广州革命的报道，为理解广州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也有助于理解广州革命所产生的世界影响。事实上，国共为什么合作、国共之间的冲突、中国共产党的困惑等，追根溯源，都可以在列宁理论里找到原因。

(4) 通过史料的罗列和分析，本书想提出一个观点：广州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圣地。与瑞金、延安不同，这个圣地是由国共两党共同缔造的。它是国共合作的策源之地、激情之地，是全国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

(5) 历史的发展，使得广州又成为国共合作的是非之地、伤心之地。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中共指导错误，还是国民党太强大？为什么激情的中共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软弱无力？本书提出的解释是：列宁理论本身蕴含了太多的局限性，理论的局限性使得共产国际、中共在面对复杂的局势时提不出改变局势的根本办法。

笔者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在“三大”前后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及启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叶剑英早期军事生涯》、《阮啸仙与广东农民运动》等相关论文发表在广州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学术论文系列《广州农讲所纪念馆论丛》上。书中部分内容《中共三大与广州青年运动》在《嘉应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农民运动》在《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上发表。以上工作为撰写本书做好了准备。

尽管笔者已经尽可能多地收集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从而尽量客观去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的诸多事件，然而限于客观条件，本书所收集的国民党方面的材料还是不足。这是本书遗憾的地方。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广州的党史和历史文化工作作点贡献。



第一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8年革命，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它总是和世界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影响下的大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总能清晰地感受到国际因素的脉搏。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前十几年，莫斯科的理论、政策以及行事方式，都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正如学者所言：“中共所领导的这场革命，就其基本内容和方向而言，都是得益于俄国革命性质的影响和规定的。恰恰是由于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这种特殊关系，由于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指导，由于后者对于前者的援助乃至干预，中国革命才走上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①确实，很多中国革命历史问题，放到国际大环境下，才有更恰当的解释。尤其是在1921—1927年这个时段，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本身没有对中国国情做过深刻分析，也没有太丰富的领导革命的经验，因而受莫斯科指导和影响更为明显。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历时三年半。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实现以及发展，乃至结束，苏俄、共产国际的态度和策略在其中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理论

早在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就陆续提出了关于

^①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一系列原则问题。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发表。1920年7、8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等相关决议。这一系列的文章、决议，集中体现了列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理论。正是列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理论，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

列宁认为，在民族问题上“不应当把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而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一般人民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①。这就告诉我们，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问题，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国家的革命经验，而要基于经济和社会阶级的具体分析，作出具体的决策。

列宁认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②。这就为各国革命者勾勒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的大致框架：所有政策的核心，应指向团结各阶级，以取得民族独立，消灭民族压迫。

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国家。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形势是险恶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反俄联盟，必欲除之而后快。列宁认为，“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资料》（内部刊物），1984年，第2~3页。

^②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资料》（内部刊物），1984年，第3页。



帝国主义之外，他们别无生路”^①。这样，列宁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问题上升到世界革命的高度，认为苏维埃俄国必须要团结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者，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

而且，苏维埃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支持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要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者结成巩固的联盟，“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实现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②。这就为共产国际指导甚至干涉各国革命提供了组织上的理论基础。列宁甚至更进一步提倡国际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专政（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③历史证明，苏维埃俄国的支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民族特点，随着历史的演进，外部的过度支持或干涉有时候会对革命起破坏作用。对此，斯大林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当初建立共产国际时，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能够把全世界的运动领导起来。这是我们的错误”^④。

列宁特意提到，“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进行民族革命的要点，其中第一点就是“各国共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资料》（内部刊物），1984年，第3~4页。

^②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资料》（内部刊物），1984年，第4页。

^③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资料》（内部刊物），1984年，第6页。

^④ 《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共产国际（1919—1943）》，2004年，第812页。



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①。为什么在这些落后国家可以帮助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而不能直接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列宁认为，这是由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列宁分析道：“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而且这种情况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特别厉害和顽固。既然这些偏见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基础急剧改变以后才能消逝，那这些偏见的消逝，就不能不是很缓慢的。因此，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同样，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指出的不信任心理和偏见，必须作某种让步。”^② 在这里，列宁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式，认为落后国家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落后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偏见、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特别严重，各国共产党要充分认识到这点，必须对这种落后作出某种妥协和让步。

但同时列宁也认为，“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文化特别落后的国家进行民族革命，既要让步，不应该过多提及“共产主义”，同时也要保持独立性。列宁论述道：“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③ 历史证明，列宁的这种“让步理论”确实有助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者结成革命联盟，从而推动民族革命的发展，但是当革命联盟内部右派占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资料》（内部刊物），1984年，第6页。

②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资料》（内部刊物），1984年，第8页。

③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资料》（内部刊物），1984年，第7页。



据优势时，当革命形势发展到左、右派的利益起冲突的时候，一味求合作可能要使无产阶级政党付出血的代价。这也显示了列宁理论在各国革命具体运动中的局限性和僵化。

列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理论的内容是丰富的，因其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设想，该理论一出台就饱受争议，但列宁依靠他的革命威望说服了反对者，并成功推行了其革命理论，“列宁关于把农民组织起来革命的设想，受到列宁的苏维埃同事们的怀疑，但是，他的主张得到亚洲代表们的大力支持。相反，亚洲的代表对关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援助民族资产阶级的提案提出强烈的异议，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妥协。但是，他们终究被列宁说服了。此后，这个提纲便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资本主义的后进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的指针”^①。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哲学观点对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经济、阶级和文化的分析，并与苏维埃俄国的生存和发展、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从而提出了一整套苏俄（联）、共产国际帮助和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列宁的这一系列革命理论尽管饱受争议，但仍然成为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宪法”，这尤其充分体现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热爱学习、迫切想改变中国现实的中国革命者，曾经严格地执行了列宁这一系列革命理论。这些理论和方法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

第二节 共产国际、苏俄（联）的东方政策

在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理论指导下，共产国际、苏俄（联）长期以来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朝鲜、越南、菲律宾等东方国家民族革命进行大规模帮助，甚至在自己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出卖前

^① [日] 波多野善大著，罗可群译：《国共合作》，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982年版，第8页。



沙皇皇室财产取得资金来帮助这些国家革命。共产国际、苏俄（联）的东方政策，既有列宁理论的指导，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而共产国际、苏俄（联）的大力援助，也对远东国家的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而要理解中国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离不开对共产国际、苏俄（联）东方政策的梳理。

一、出于世界革命的需要

早在1912年1月列宁主持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就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①。在列宁的影响下，共产国际非常重视中国革命。1923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②在离开中国前夕，写信给廖仲恺，其中一段话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中国革命一直是共产国际特别重视的问题：

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机构，第三国际于1919年成立伊始就认识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民族运动的重要性。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特别重视殖民地问题，随后，讨论中近东问题的巴库会议和讨论运动问题的伊尔库茨克会议均突出了这个问题。1922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东方各国革命工作的成果做了比较，并制定了新的提纲以指导实际工作。一旦你（指廖仲恺）能摆脱繁重而收效不大的省长职务，读一读这些大会和会议记录，你将清楚地看到，在共产国际眼中，附属国的民族主义斗争对于世界革命的意义并不亚于西方国家工人和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② 马林，荷兰人，全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受正义感驱使，马林很早就投身于工人运动。1913年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1914年他在爪哇建立社会民主联盟。1918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1920年他作为爪哇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1921年6月至1922年6月，1922年8月至12月，1923年2月至7月，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三次来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战”爆发后，马林参加了荷兰反法西斯斗争，1942年牺牲。对于马林在中国的活动，一直争议颇多。他在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虽既有符合中国国情的成分，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但也有超越中国政治经济实际情况的成分，给中国革命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贫苦农民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①

马林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从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随后的多次重要会议中，共产国际非常重视东方国家的民族革命，并且认为其意义不亚于西方国家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建立一个坚强的真正独立的中央政府，并非纯属中国一国事务，它具有直接的国际意义。”^② 1920年，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会上，马林深得列宁信任，会后，他被列宁派遣到中国执行东方战略。马林肩负共产国际使命，长期以来活跃于中国，在推动中国民族革命方面不遗余力，他是共产国际、苏俄（联）东方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在马林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逐渐实现的。

二、出于苏俄（联）国家安全的需要

十月革命后，苏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面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方两大战线的包围。1917年12月，日本向美国等协约国建议，出兵西伯利亚，对苏俄革命进行干涉。出于对苏俄革命的共同仇视，日、美、英等国均出兵西伯利亚，威胁新生的苏俄政权。特别是日本，对富饶广袤的西伯利亚早就垂涎三尺，因而成为干涉最积极的国家，“日本不断向西伯利亚增兵，最多时候达到7.3万人。贝加尔湖以东所有村镇都有日军。从海参崴到赤塔，不论是西伯利亚铁路，也不论是中东铁路，各个车站都挂上了日本国旗”^③。

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对苏俄（联）远东地区的封锁，苏俄（联）需要支持东方国家的民族革命。

三、出于苏俄（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竞争的需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针对远东和太平洋问题，美、英、日等国召

^① 《致廖仲恺的信（1923年7月21日，广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页。

^② 《中国建设与对苏关系（1922年1月10日，桂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3页。

^③ [日]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1页。